

聚焦张维迎：一个争议经济学家的复杂性与张力

執筆者代表 李 春利¹

執筆者 许昊 张龙 腾兴建 李梁楠 杨建强²

摘要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争议不断的话题人物，张维迎的复杂性体现在他的许多方面。张维迎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与重视政府主导作用的主流观点颇有不同，这恰好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相契合。这些观点直接体现在他对“市场与政府”、“企业家研究”等问题的看法上，他强调市场本身的力量和政府干预的弊端，以及在一个良性的市场运作中，企业家及其背后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张维迎还尝试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引入社会实践当中。在大学改革问题上，他强调竞争和淘汰机制的重要性；同时，他还主张重铸“经济学的人文精神”，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应该为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良序社会的建构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些观点虽然使张维迎饱受争议，但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学术问题和社会现象的独特思考，进而为学术研究和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而又难能可贵的张力。

关键词：张维迎；奥地利学派；市场与政府；企业家精神；大学改革

两年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政策思辨会”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日本爱知大学博士研究生的课堂上也曾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过深刻有趣的思辨讨论，其研究成果汇总为论文“产业政策存废之争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思辨会（日本篇）综述”³，已公开发表。2018年5月，作为对产业政策论争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又选取了这场思辨会的主角之一——张维迎，进行了新一轮集中报告。这次集中报告试图透过这位颇具争议的学者，追溯其学术思想到社会思想的渊源，寻找他为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经济改革提供一种独特的张力。

张维迎，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历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对于张维迎来说，2016年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争”，显然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站在了舆论争议的中心。从其早年关于双

轨制以及企业家的观点，到入仕后在北京大学教学改革上所引发的争议，张维迎都因其独到的见解、以及大刀阔斧的行动而备受关注。当然有人视之为“异端”，有人却称赞他引发的深度思考和推动学术讨论的张力。而以一个“批评者”自居的张维迎，无论是其学术研究，还是他在社会实践问题上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本次来自南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张龙、腾兴建、许昊、李梁楠和杨建强，将分别从①“张维迎与奥地利学派”、②“张维迎论市场与政府”、③“张维迎的企业家研究”、④“张维迎论大学改革”、⑤“张维迎论经济学的人文精神”五个方面聚焦张维迎，对他学术思想的起源、研究领域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讨论。现将集中报告的主要内容作一分享，以飨读者。

I. 张维迎与奥地利学派

很多学者认为张维迎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张维迎也认为自己的观点与奥地利学派有一脉相通之处。他关于赚钱、市场、政府及企业家等方面的论述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观点颇有亲和性。2008年以后，张维迎对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再发现，开始推广并且发扬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奥地利学派在知识观与个人主义等方面的论述由此成为张维迎经济学观点的理论基础，他自己在“产业政策论争”中称之为“米塞斯-哈耶克范式”。2010年以后，张维迎在反思主流经济学的工作中认为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从人的主观理性行为出发，将市场和经济视作是一个不断发现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企业家精神在这个过程中被放在重要的地位上，而政府则尽可能不要干预市场的自发运行。

本小节通过简要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掌门人米塞斯与他的关门弟子哈耶克的相关经济学观点，尤其侧重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探讨张维迎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渊源。

1. 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是19世纪晚期出现并逐渐活跃在西方的一支经济学理论流派。该学派在经济学中的主要观点以反对采用或模仿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人的行为或社会现象为主要特征之一⁴。现代经济学中许多著名的理论观点，比如产权、不对称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过程等都可以在这派理论家的论述中寻找到渊源⁵。

该学派可以追溯到1871年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而这一学派名称的正式出现距此则要晚十多年。古典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价值受到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而门格尔等人则认为价值取决于今后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实用性⁶。门格尔的这

一主观价值理论影响了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 1851-1926)等人。维塞尔在《自然价值》一书中从主观估价出发，探讨了生产分配活动。庞巴维克则在《资本与利息》中提出，通过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过程中引入时间因素，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成为了可能⁷。

庞巴维克在奥地利政府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财政部长后开始组织学术讨论，这一学术讨论会此后逐渐成为奥地利著名的学术中心。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都参加过这一学术讨论会。米塞斯也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⁸。这一学派中虽然不同理论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通常从事两方面工作：一是按照有目的人类行为理解经济现象；二是追溯这些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这些工作常常建立在三个共同假设上：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关注过程而不是关注均衡⁹。

自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社会与学界的重视。相比之下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更加深入人心。但随着社会发展，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理论开始无力应付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眼光重新投入到对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阅读和探索中。

尤其是在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和米塞斯等人的著作被先后翻译成各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对美国前总统里根来说，哈耶克扮演了重要的顾问角色，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宣称哈耶克是她在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目前已经基本上完全被主流经济学吸收¹⁰。下面简要介绍一下米塞斯与哈耶克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相关理论观点。

2. 米塞斯的主要经济学思想

米塞斯 1881 年出生于奥匈帝国，1900 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时受到门格尔思想的影响。其后米塞斯将门格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以及主观主义拓展到经济学领域，甚至成为对人类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¹¹。米塞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自然科学主义，这一认识论倾向尝试将所有事物都以自然科学的方式进行理论解释。他提出有些事物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描述和分析的，人的行为就是这样一种在自然科学可观察、描述的范围之外的事物。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必须将个体的主观行动目的纳入考量范围¹²。他在论述中更多地将人的主观理性行动理解为市场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来源，因此其理论更多关注市场的运行、组织和实践过程，而非资源的配置问题。

(1) 个人主观主义

米塞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人的行为并非完全自然科学式的条件—反应过程，而是包含了主观目的在其中¹³。这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外在的某些事物是否以及如何人的心灵中产生了某些观念、价值判断和意愿。因此，个体实际上成为学术研究不能再继续分解下去的基本对象，从而成为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的学科的起点¹⁴。

由于包含了主观目的在行动之中，人的行为总是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展开，并寻求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结果。因此人由主观发出的行动是理性的，个体的行为选择体现了自身主观的价值评价。经济学作为对行为选择研究的学科，正是建立在对个人主观的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一书中批判奥地利学派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方法论，提出人的行为是有意识达到某一目的的实践，仅从这一事实出发能够以纯粹的演绎推理来解释一切行为。因此在米塞斯本人来看，其个体行动理论是先验的，不需要经验材料来证明的¹⁵。

米塞斯认为市场中无论是购买者还是消费者，其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寻求对自身需求的满足，因此他们会理性地分析市场行为能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只有人们主观上认为某一市场行为的结果是对自己有利的，这一行为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购买者主观的评价决定了他们愿意为商品付出的价格¹⁶。由此可见，在米塞斯的理论视域中，市场行为或经济行为，是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成本与收益的均衡考量。

(2) 商业周期理论

米塞斯认为，信贷扩张并不会马上造成总体物价水平的上升，也不能使得利率一直降低来刺激投资。因为增加的货币供给并非在社会中平均分配，而是要先进入信贷领域，然后逐渐通过信贷进入投资、再进入消费领域¹⁷。在货币供给增加的初期，由于信贷扩张，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家受利率降低的吸引而增加投资。以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为主的投资又会拉动工人的就业，并进一步导致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而这则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家扩大投资的决心，开始投资更多，甚至是过多的项目、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等。这样，经济繁荣建立在信贷不断扩张的基础上。

资本品的投资需要与适当的储蓄相适应才能保证增长。然而公众的时间偏好仍然不变，这意味着公众仍然按照之前的比例来消费，储蓄因而没有得到增长。储蓄并不足以购买资本品的投资资金时，信贷市场的利率就将趋于上升，从而导致信贷业的紧缩。企业有可能破产崩溃，而市场则开始衰退。米塞斯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调整过程。市场通过消化过度膨胀的“不健全投资”，从而回归到足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¹⁸。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的危险性预示着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这是市场为了回到良性运行状态所进行的自我调整。这一商业周期理论后来得到哈耶克的推进与分析，被称为“米塞斯—哈耶克模型”¹⁹。

(3)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

米塞斯认为恰当的经济核算是对于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体系。任何企业中的每一个工厂或分部都在独立进行核算，以计算原料和劳动的成本，从而总结自己的经营成果²⁰。以此作为论点，米塞斯认为在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商品的价格体现了市场上的供需状况，因而为合理的经济计算提供了可能性。如果没有私有产权制度，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交易；而缺乏了自由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通过价格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²¹。

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计算是与市场价格体系相脱离的独立系统，在这一系统中，由于取消了市场价格机制，社会上没有可供计划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信号与指引。因为以价格为指标的核算体系需要建立在“所有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由市场决定”²²这一基础之上。这倒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中取消了货币的存在，而是说由于价格体系无法准确地反映出各项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供需状况，因此计划者无法准确理解到社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对于不同性质的生产过程及不同产品之间的成本与效益无法进行直观有效的比较，从而也就无法了解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足或浪费的情况。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从根本上不可能做到理性地计算成本或配置生产要素，从而达到满足最为迫切的需要²³。

在米塞斯看来，由于无法做到有效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因此难以持久。哪怕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建立一个生产资料的人造市场，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经济计算²⁴。因为形成市场价格的动力来自于资本家和企业家通过满足消费者需求而实现的利润最大化。社会主义建立了公有制度，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缺乏企业家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自由处置的可能性。当企业家无法通过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以追求最大化利润时，价格体制所需要的动力来源就无法实现。因此只有在

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合理的经济计算，社会主义无法进行恰当的模仿²⁵。

(4) 企业家精神

由于米塞斯坚持个人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认为每个人的市场行为都是个体理性决策后做出的行为选择。如果这一选择在其行动的可选择域中不是最优的，甚至是有害的，那么他就没有行动的必要性，因此一定不会行动。这样，市场中就不存在古典经济学理论家所宣称的“等价交换”²⁶，因为如果个体不能从中获利，他就没有行动的刺激动因。在市场中，无论对于生产者而言，还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经济行为的最终实现是建立在其主观对价值的认可基础上的，因此市场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面向商品的成本。价格则体现人们主观上需求和价值的变化。

米塞斯认为成功的企业家就是那些能够及时获取到市场变动信息，认识到这些信号背后体现的消费者需求的变动，从而能够提前做出判断，调整自身的经济决策，最终满足消费者变动的需求的人。成功企业家的天职是利用稀缺资源最有效率地服务社会和公众，满足其最紧迫的需求²⁷。因此，市场过程是企业家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企业家的发现过程。通过企业家，市场才能认识并发现最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配置生产要素的方法。

3. 哈耶克的经验主义进化论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是奥地利出生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其主要观点是坚持自由市场制度，批判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理论。他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奥地利学派最受人瞩目的明星，从而大幅度提升了奥地利学派的国际知名度和认同度。他早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经济学期间，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以及维塞尔等对其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

(1) 无知的知识观

哈耶克从个体主义的角度出发,反对粗糙的“理性人假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视域下的个人是掌握了完备知识的个体,而这一观点并不符合社会的现实状况。他提出社会知识是以一种分散的、零散的方式分布在社会中的所有个体之中,而不会以一种集中、整合的形态存在²⁸。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过程,就是个体互相之间的知识发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理性始终是处在有限度的情形之下,即使是建立在当前最高、最有效的理性前提下,我们的计划与建设仍无法做到准确和完美。

在这样的知识观指导下,哈耶克认为市场中的个体虽然掌握一定的信息,但对于市场的认识总是缺乏和滞后的,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个体在市场中都是处于“无知”的状态之中的。不过,个体通过其有目的的个人理性行动,能够在市场中不断地获取他人的信息及发现新信息。因此市场和经济总是能通过个体自身发出的主观理性行动获得一定的发展。均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知识、信息和各自的意图越来越趋于协调一致,由此企业家们的预期变得越来越正确。因此价格和利润作为人们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工具,帮助人们克服了知识的割裂状态,并促成了均衡的形成²⁹。

(2) 反对唯理主义建构论

在“无知”的知识观基础之上,哈耶克认为我们由于不掌握足够的信息,因此总是处在“理性不及”的状态下的,因此任何倾向于建立规范和制度的行为不但可能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个人理性常被视作我们认识、运用及反思自身能力的工具,但是它在逻辑上的局限在于永远无法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反思个人理性的限度,亦即其无法离开其自身来检视其自身的运作。另一方面,个人理性建立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基础之上,是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理性。由此其也无法脱离这些方

面的基础,以一种“脱嵌”的方式给予这些方面以反思和评价³⁰。

哈耶克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传统对政府干预支持态度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干预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基础上,即认为在政府既有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下,为了改善资源配置状况而采取的对经济的干预是可行的。哈耶克认为市场效率来自于通过竞争过程实现的、对分散在市场参与者中的知识的发现和利用,而执政者或制度建立者由于不掌握如此分散的、众多的所需的知识,因此不具备建构制度的条件³¹。而通过理性推导和演绎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现了人类认知中的“自大”。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由于取消市场,通过人为的资源配置来进行社会建构,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3) 政府职能所在

哈耶克旗帜鲜明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与他人进行论战。他曾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讨论货币理论、政府干预及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源;也与奥斯卡·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 1904-1965)讨论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进行经济核算的可能性³²。虽然他认为“即使是最温和的政府干预和再分配也会导致集权主义的产生”³³,但哈耶克并非政府绝对无用论的提倡者。哈耶克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而非无政府主义者。

既然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运作,那么在经济和市场发展的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在哪儿呢?哈耶克认为,顽固坚持绝对的“自由主义”价值,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实际上是进入了误区。自由主义原则并不意味着政府活动完全限制在仅仅维持法律和秩序。因为虽然市场是最为有效率的经济方式,但市场却无法超越自身来为市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许多公共性质的物品对于市场发展非常重要,比如卫生与健康设施,但是却无法通过市场的自发作用提供³⁴。因此政府应该承担起这类责任,为经济和市场的发展提供公共物品。哈耶克认为,在

这类活动中，政府的功能并不涉及对经济的干预与强制³⁵。

4. 张维迎对奥地利学派的再发现

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的动力究竟来自于政府还是来自于市场？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数个世纪以来的讨论中经久不衰，总是能引起一批又一批研究者投身其论证之中。张维迎在这个群体中或许不算独树一帜，但至少旗帜鲜明。

张维迎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主修政治经济学。他早期对市场、企业家及赚钱等方面的理论观点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有亲和之处，然而此时的张维迎对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自我认知。在就学期间，他曾组织对西方经济学的讨论。当时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是分析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为了更好地掌握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脉络与内部逻辑，张维迎组织了读书会，并自告奋勇担任讲授者。在这段时期，张维迎并未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与奥地利学派之间存在的内在亲和性。1994年张维迎从英国牛津大学回国后，与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学者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于2008年扩大发展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直到2008年，张维迎才正式放下了硕士及博士课程在学期间坚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立场，开始转向推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当时张维迎在芝加哥的一场经济学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产权变革、企业家兴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张维迎分析了中国过去数十年间企业家是如何出现，并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与会者中有人提出他的观点听起来就像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等人对经济学理论的论述，张维迎对此的回应则是其观点一向如此³⁶。对于这段经历，张维迎提到：“尽管我一直以为自己信奉的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但事实上，我的思想更接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³⁷。

他早期发表的一篇为赚钱“正名”的文章曾遭到反资本主义阵营人士的激烈批评。后来张维迎自己在文章中提到，他80年代发表的两篇关于价格双轨制和企业家作用的文章现在回过头来看，基本上可以视作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应用³⁸。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张维迎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期间，米塞斯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家的观点更坚定了他对市场、企业家和国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³⁹。按张维迎自己的话来说，“我对市场的信念有着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的彻底性”⁴⁰。

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张维迎认为要限制政府的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防止政府对经济和市场发展进行干预⁴¹。政府需要做的是保护个人自由以及私有产权，建立能够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法制等社会制度⁴²。他在论文中提出政府的干预具有“认知限制”和“激励扭曲”。认知限制意味着政府无法认识到创新和可能发展的方向，他提出如果预测成为可能，那么也不需要政府进行预测，因为精明的企业家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⁴³。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米塞斯与哈耶克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上所持观点的投影。

在面对市场时，张维迎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虽然市场造就了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但同时也提供了“声誉”机制作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途径。虽然分工和专业化导致每个人都只掌握一部分信息，但是建立品牌参与市场竞争能够从“声誉”的角度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⁴⁴。他从主观能动性出发，认为这是由于市场中常常存在不均衡的状态，企业家才能发挥自身的才干，通过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市场逐渐趋于均衡⁴⁵。因此，张维迎坚定地认为市场最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且最能体现人的自由与责任，以至于他认为市场一定程度上与人类的道德联系在一起⁴⁶。在张维迎的论述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他于米塞斯和哈耶克对于“无知”的知识观、试错以及道德等理论观点所具有的亲和性。

II. 张维迎论市场与政府

在张维迎的经济学观点中,受奥地利学派影响最深者,莫过于他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表述。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各经济学派关注的焦点,甚至一度成为划分经济学派的标准之一。对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曾有一种流行的方法,即将其划分为“政府干预”派和“自由放任”派。目前最为活跃的经济学派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两学派争论的焦点即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看法不同。

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建国后的三十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放权让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今,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不等于说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认识问题就解决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调整仍然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因而新的历史起点上,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倾向于对市场加强监管,动用政府的力量刺激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危机中,政府运用权力干预经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一直有专家学者怀疑这种干预的效果,张维迎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张维迎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学术观点,一言以蔽之,即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足够强大,它根本无需政府干预,相反,政府的干预反而会导致市场失灵。他的这一结论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个是从市场的力量论证自由市场的优越性;第二个是论证政府干预市场所带来的弊端。

1. 自由市场的力量

张维迎首先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的奇迹。他引述美国学者德隆(J.Bradford DeLong, 1960-)的研究,指出“人类97%的财富,是在

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⁴⁷。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在过去250年里出现?“唯一的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⁴⁸市场经济为何能创造巨大的财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指出,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每个人的“利己之心”转换成“利人之行”。张维迎据此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⁴⁹。

张维迎在强调市场的力量时,有一个核心的论点,即市场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声誉”机制。他指出,“市场是有记忆的,每个人在交易中的所作所为,不论好坏,都会被记录下来,积累成他的声誉。好的声誉意味着更高的信任、更多的客户、更大的利润。正因为如此,在市场经济中,诚实就成为最好的竞争策略。如果没有政府保护的话,那些坑蒙拐骗、不讲信誉的企业终究将被市场淘汰出局”⁵⁰。也就是说,企业要想一直获利,必须积累好的声誉,而企业对声誉的追求又可以约束企业的行为,敦促其诚实守信。总之,“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⁵¹

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声誉机制的存在,使得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足够强大,它不需要政府的干预。正如张维迎所说的:“市场经济之所以能正常运转,主要不是因为有一个政府在监督做什么,而是因为‘信誉机制’这只隐形眼在监视着每个人的行为。”⁵²正是由于这只“隐形的眼睛”的存在,使得陌生人之间由于相互信任而得以合作。张维迎指出,这种合作“是在分工、专业化基础上的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推动技术的进步，所以能创造更大的价值”⁵³。

在张维迎看来，正是由于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就登堂入室，成为解决“市场失灵”的灵丹妙药。但事实是，政府管制常常又成为声誉机制最大的破坏力量。政府管制越多的地方，企业越不注重自己的声誉，市场秩序越混乱。也就是说，政府的管制实际上破坏了声誉机制，从而削弱了市场自身的力量。

2. 政府干预的弊端

相比于论证“自由市场的力量”，张维迎更多地强调政府干预的弊端，在张维迎看来，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

政府为何要干预经济？张维迎曾经总结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有几个理由：

“第一，外部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不存在外部性。如果有外部性，市场就失灵了。第二，垄断。只有完全竞争的市场才是帕累托有效的，如果完全竞争达不到——而且现实中确实不可能达到，市场就会失灵，需要反垄断政策来矫正。第三，信息不对称。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信息是对称的，实际上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需要政府干预。”⁵⁴不过，他认为上述的每一个理由都不成立，并且着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所造成的种种弊端：

首先，政府的管制会破坏人们的信誉。管制越多，政府官员的权限自由就越大，未来环境就越不确定，结果就越难以预测。这就促使人们只追求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期利益。另外，在张维迎看来，实施管制的人效率低下，最终对信誉的影响是管制越多，越没有信誉，大家都不讲信誉，就引来了更多的管制，最后只有管制，没有信誉。⁵⁵

其次，政府认知上的局限性，会导致管制失败。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

在深刻的角色冲突，政府就可能利用它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⁵⁶认识到这一点后，张维迎对管制作出了两个判断：“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二是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骗子以并不高的贿赂成本降低了他进入市场的门槛。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管制太多，反而误以为是管制太少。结果，管制一再被强化，变本加厉，最终令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当然也就无从谈起。”⁵⁷

再次，政府的干预和管制常常会造成垄断。在这里，张维迎所说的“垄断”是指政府用强力施加的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如用法律或行政手段限制行业准入，发放许可配额，给予专营权，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税收、信贷、补贴等方面的歧视，都会带来垄断，这才是真正应该反的垄断。而现行的所谓“反垄断法”，在张维迎看来，本质上是借反垄断之名行干预市场之实，“反垄断法的本质是反竞争”⁵⁸。反垄断法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低效率的企业对高效率企业或者后来者对先来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挡箭牌。这样的“反垄断”必然扼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最后，政府官员的自身素质并不高，政府本身也是由人控制的，控制政府的人与生活中的每个人一样，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既不比普通人更好，也不比普通人更坏，他们容易被诱惑。因此，当政府用强制力进行管制的同时，政府官员也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别人的产权，剥夺别人的自由，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因而张维迎进一步指出：“如果政府的力量过大，市场不仅难以有效运行，甚至可能彻底消失。”⁵⁹

“市场能管理好的由市场管，市场管不好的由政府管”，这是经济学家为未来体制勾画的一个目标模式。但是在认识到政府管制的弊

端之后，张维迎指出，现在的认识应该更进一步：“市场管不好的政府也不一定管，不要以为市场管不好的政府一定能管好。因为许多经验表明，政府往往比市场更不完善，政府在消除市场‘缺陷’的同时常常创造出更大的‘缺陷’。”⁶⁰此外，张维迎还从动态博弈的角度指出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府”⁶¹。

总之，在张维迎看来，由于信誉机制的存在，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十分强大，它无需政府的干预也能有效运行。相反，由于政府官员的自身素质并不高，因而政府权力越大，越容易引起腐败现象。此外，政府的管制不仅会破坏市场的信誉机制，而且会导致法定垄断和行政垄断的产生，从而破坏了市场的力量，阻碍了市场的有效运行。一言以蔽之，不是因为市场失灵所以需要政府干预，而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了市场的失灵。

3. 争议与启示

张维迎的学术观点非常鲜明，即提倡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回归亚当·斯密”、“埋葬凯恩斯主义”。由于他的观点不仅与当前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不同，而且也和当前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观点相左，故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尤其是在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处于主导地位。而张维迎却旗帜鲜明地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在国有制基础之上的；唯有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市场经济体系要成功建立，民营化不可避免。国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⁶²。

张维迎此论甫出，批评者便接踵而至，如盖凯程对这种观点评价为：“凡是私有的都是好的，凡是公有的都是坏的——赋以私有制以形而下的技术肯定，却给予公有制以形而上的价值苛求；卸脱私有企业的价值负担，却让国有企业背负沉重的道德赤字……以国企必然低效率论为切入点进而判定‘公有制=低效率’、

‘私有制=高效率’是支撑其私有化逻辑最深层的理论根据。但这一论据既缺乏理论说服力，更缺有效的数据支持。”⁶³

2014年7月，国内两大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林毅夫强调“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才能做得更好。而张维迎强调“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⁶⁴。不可否认的是，张维迎指出的政府管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是存在的，尤其是政府权力过于膨胀且缺乏约束力，企业家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和官员搞好关系上，导致腐败现象增加。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一概否定政府推动型的增长模式呢？

例如有的学者就认为“政府推动型的增长模式，尽管带来一些问题，但我相信这些问题会引起重视并逐步加以控制，比如腐败问题，会逐步加大力度惩治，因为腐败到了一定程度，会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这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人民无法容忍的”⁶⁵。当然，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问题并不在政府是否进行了干预，也不在于干预的是多是少，而在于，这种干预是否正确”⁶⁶。

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在哪，无论是张维迎还是林毅夫，谁也不能说服谁。依笔者所见，市场和政府二者或许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而很难用一条线将二者截然分开。李春利教授曾经指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犹如“中国原创的阴阳太极图”，认为它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⁶⁷，这种比喻非常形象生动。政府和市场各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各有其弊端，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两者权衡起来，“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难。

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也会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例如，西方一直以来都提倡自由市场，但在1929年开始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中，正是由于罗斯福政府大力干预经济才使美国迅速从危机中走出来。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投资四万亿刺激经济；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将破半的通用汽车公司一时收归国有化。由此可见，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很难用一条直线划出，而且还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动，正如阴阳太极图的消长变幻一般。实际上这也是张维迎和林毅夫谁也不能说服谁的原因所在。不过人们都应该明白，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一定是那些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国家。因而我们应该不断地吸取经验教训，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功能，同时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

III. 张维迎的企业家研究

在“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争论中，张维迎对自由市场的推崇，以及对政府干预的反对，这样的观点还体现在他的企业家研究中。事实上，在张维迎的学术研究中，“企业家”这个命题一直是其研究的核心要素。从研究生时代开始，张维迎就在关注中国的企业家问题，并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推动中国的企业家研究，并作出了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学术贡献。不仅如此，他还在学术之外，不断通过不同的渠道为中国的企业家发声，强调尊重企业家，善待企业家。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了解张维迎，就不可绕过其在企业家研究上的观点和贡献。

1. 张维迎企业家研究的渊源

张维迎对企业家问题的最早关注发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在1984年，仍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张维迎就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⁶⁸一文，文章中强调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要使经济富于活力，就离不开成功的企业家，就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在当时就得到了广泛关注。

随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张维迎就职于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和改革政策的研究工作。其时，在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使得企业家问题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对保证改革成功和体制的有效运行具有关键的作用，但在有关如何造就企业家，特别是企业家的形成与所有制的关系上，经济学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是不重要的；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不是所有制。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引证市场经济重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事实”，特别是日本的例子说明，正是由于所有者不起作用了，企业家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张维迎在此时的观点恰与这些主流观点相反。张维迎认为，企业家是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真正的财产所有者，就不可能有真正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其核心观点详细地反映在张维迎的“企业家与所有制”⁶⁹、与“造就真正企业家”⁷⁰两篇论文中。当然张维迎也坦言，此时他还缺乏一种理论对相关流行观点进行有力反驳。

1987年张维迎前往牛津大学，作为访问学生深造学习，其开始有机会系统地接触西方最新的现代企业理论文献。但是已有的文献仍不能回答张维迎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成为企业的老板？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为什么资本所有者成为委托人？

1990年9月张维迎回到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委托—代理理论创始人之一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ss, 1936-），以及产业组织理论专家唐纳德·海（Donald Hay）。为了回答自己预设的问题，张维迎决定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定为“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在张维迎看来，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剖析古典资本主义企业

中经营者—企业家—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现象：为什么从事经营决策的人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为什么资本家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只有解释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现代企业制度。

张维迎的博士论文研究进展顺利，其论文的初稿作为硕士论文获得 1992 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完成后的论文更是受到了其导师的大力褒奖，并在 1994 年英国皇家经济学年会上宣读，得到与会者的好评。这篇博士论文的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⁷¹于 1995 年出版之后再版多次，成为企业研究中经典之作。

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张维迎将企业家作为企业研究的核心，尝试从理论的宏观层面解释企业家的重要性。为此，他试图建立一个以企业家为中心、契约关系为本质的企业理论。张维迎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制定经营决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是最重要的功能，所谓的“企业家”就是善于制定决策的人，而人口中具有高超决策能力的企业家并不多，企业的价值就是让企业家制定决策。而为了激励企业家制定正确的决策，企业家就必须承担决策的风险，也就是拿剩余收入而不是合同收入。进一步，由于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如何保证企业决策者是真正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就成为企业制度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我们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就是自由市场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它不是法律的选择，而是竞争演化的结果。简单地说，“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的机制。

1994 年起，回国进入北大工作的张维迎，开始将自己的企业理论应用于国有企业的分析，并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论文被收集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⁷²一书。在该书中，张维迎的基本结论是，国有企业虽然可以通过利润分成和奖金制度对经营者提供短期激励，但

没有办法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更没有办法解决经营者的选择问题。原因在于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政府官员并不是真正的资本所有者，他们虽然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但并不对选择后果承担财务风险，他们重视的只是控制权受益，因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积极性选择最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担任经营者。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问题和长期激励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对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创造出真正的所有者。

张维迎还将自己的企业家理论用于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其成果反映在《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⁷³一书。书中张维迎尝试提出了“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用以替代现有的“经理人中心模型”理论。

张维迎有关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包括在《市场的逻辑》⁷⁴一书。其中张维迎的观点与科斯的的企业理论不同。他认为，企业不是市场的替代物，而是市场的运行方式。市场是一个连带责任的组织，市场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交易者之间的信任，正是通过所有者（企业家）对企业团队成员的连带责任和品牌企业对供应商的连带责任，消费者才有可能监督并信任生产者，市场才能有效、有序运行。

为了系统地表达其关于企业家问题的主要观点，张维迎还曾出版《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⁷⁵一书，在这本书中张维迎尝试利用大量的案例来说明企业家的重要性，并且详尽地论述了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具备的若干品质。

2. 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

概括起来说，张维迎关于企业家理论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要使经济富于活力，离不开成功的企业家。张维迎认为，经济学经过了二百来年的探索，终于从理论上和经验上确证了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但隐藏在增长要素后的原动力是什么，张维迎借用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熊彼特的话认为：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

其次，真正企业家必须是所有者企业家。张维迎将企业家定义为一个责权利的统一体，即承担经营风险是一种责任，取得经营收入是一种利益，缺其一都不能是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所有者自己承担经营风险，自主从事经营管理，经营收入归自己所有，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家。

第三，以“有恒产者有恒心”选择企业家。在如何选择企业的问题上，张维迎提出了识别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成本分析方法，即他认为富人做企业家的信息量大于穷人，资本家拥有自由进入企业家市场的优先权，而有限责任和负的消费约束，决定了富人做一个企业家的机会成本比穷人高，因而富有的意愿使企业家的选择和决策更实际，更可信。

最后，张维迎还强调要不断改革，善待企业家，提高企业家开拓市场的积极性。张维迎认为开发国内市场不能单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重要的是企业家精神和基础产权。只有健全产权保护，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才能激发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

3. 关于张维迎企业家理论的一些讨论

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尤其是其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中的相关理论，在面世之后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多数讨论都在称赞张维迎对企业理论的巨大推动，肯定其研究成果。当然其中也有几位学者对张维迎的理论，在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讨论，比较重要的是邓正来在《中国书评》1995年5月号（总第10期）中组织的三篇对张维迎企业理论的评价性文章⁷⁶，此外还有一篇张维迎的回应文章⁷⁷。这些争论同样值得我们的关注。

比如学者汪丁丁指出张维迎的企业理论是建立在纳什非合作均衡和纳什讨价还价博弈均衡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尤其是在博弈论理论家们已经承认纳什讨价还价博弈均衡在解释社会契约上的局限的情况下。张曙光指出，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我们应该着眼于产权关系和基本制度结构的改革，同时着力于契约关系的调整，而张维迎的理论主要关注在考察产权关系的变革，忽略了从契约关系的调整上的分析。此外他还认为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除了产权问题，还存在债务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从实践出发的角度上来看，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需要一起解决，不能忽略。

显然学者们指出的问题只能算是张维迎企业家理论中的一点瑕疵，连张维迎自己也坦诚地表示他是以“批评者”的身份在思考，因而会与一些着眼于解决问题的“建设性”观点相左。

由此，在笔者看来，虽然着眼于解决问题的观点不可或缺，但批判性的观点显然更容易激发大家的思考。当张维迎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批评者”的时候，他显然认为自己更为激进的观点才能争取到更多人对于企业家以及国内企业环境问题的更多关切。所以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包括他多年对于企业家问题的持续发声，都在不断地搅动着社会对于企业家的关注，从而推动着中国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这个层面上，张维迎的巨大贡献显然早已不限于他的企业家理论了。与此同时，超脱出张维迎的企业家观点之外，我们也不难发现，张维迎实际上更倾向于建构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其后用理念反诉现实的不合理，他的这种批判性思维也早已不限于他的学术领域，还同时暗含在他在多个领域的观点之中。

IV. 张维迎论大学改革

张维迎不仅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研究，还把目光投向教育领域，用市场理论指导教学改革。他把大学看作一个以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为目的的特殊企业，提倡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的方式

来激发大学的活力。他主导的教学改革，实际上就是他的市场理论的一次社会实践。

2003年，为响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张维迎提出了改革北大的方案。这个方案以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为改革突破口，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师队伍，直接影响了北大教师的选聘方式，甚至使相当数量的在岗教师面临解聘风险，从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也为他本人带来诸多争议。在解释方案和回应争议的过程中，张维迎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大学的逻辑。

1. 张维迎的大学改革理论

张维迎继承和发展了德国教育学家洪堡的观点，认为“现代大学的理念可以归结为：第一是创造知识；第二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并服务社会。”⁷⁸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注重教学——传授知识，更要注重科研——创造知识。因此，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研究型大学，而能否成为研究型大学关键在于教师。他说，只有那些“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⁷⁹才应该成为大学教师，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造能力的学生。于是，他把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作为改革北大的首要任务。他的改革方案始终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教师的聘任，二是教师的激励。

首先，他认为教师招聘要公开公正地面向全世界选拔优秀人才。他说，北大存在严重的“学术近亲繁殖”问题。北大教师的来源，一直以本校的应届毕业生为主，不仅阻碍了与外部的学术交流，也使得年轻教师被束缚在“家族化”的师徒关系当中，缺乏真正的学术自由。因此，要激发学术的活力，就要引入外部竞争，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而为保证选聘的公正性，避免裙带关系对选聘结果的影响，他进一步提出了不留本校毕业生的招聘原则。

另外，他还提出教授的终身教职制度和学科的末位淘汰制度。张维迎认为，为确保自己的地位，招聘委员会的教授很有可能淘汰比自

己优秀的新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武大郎开店”的现象。为避免这一问题，他提倡采用欧美大学的终身教授制度，给经过严格选拔的教授提供终身教职。这样他们的地位就不会受到新人的影响，由他们组成的招聘委员会便可以公正地评价新人，选择更为优秀的人才。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学科末位淘汰制，若一个学科科研成绩长期落后就要被整体裁撤。这样也能倒逼招聘委员会必须招聘优秀的新人，以保障学科的生命力。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教师招聘过程中的弊端，提高新聘任教师的质量。

其次，张维迎把讲师、副教授阶段看作是新聘任的青年教师的岗位试用期。他说，研究型大学招聘的目的是选择合格的教授，因而被聘任的青年学者都应该是教授的候选人，但他们最终能否成为教授，需要一个比较长、但是有限的时间段来培养和考核，这就是讲师、副教授阶段存在的意义。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要有一定的期限，若到期不能晋升为教授，就说明不适合原来的教师岗位，应该另谋他职，这就是“不升即走（up or out）”制度。他说这种制度是双赢的，对于学校而言是剔除了不合格的教师，对于学者本人来说是离开了不适合的岗位，双方都获得了重新选择的机会。而且这种制度能逼迫学校改变论资排辈的提升方式，优先提升最优秀的人才，否则优秀人才就会离开学校。这样便能形成按能力晋升的规则，避免人才的浪费。

第三，张维迎认为，在教师的晋升过程中，能对教师能力进行评价的主要是同一研究领域的其他学者。他说，大学教师的价值在于他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然而知识的价值是很难评估的，无论是在校学生、学校的管理层、还是校友，都无法胜任评估者的角色，只有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同领域的其他学者才能做出相对准确的评价。评价的依据，应该是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不是论文的数量。他还认为，即便是没有晋升压力的终身教授，也应该定期接受考

核，以便督促他们继续科研，只不过这种考核不再需要“不升即走”。

第四，为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的相關制度顺利实施，必须要理顺大学的管理关系，张维迎认为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教授的权力，一个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张维迎反对纯粹的教授治校，他认为集体决策会导致效率的低下，而且教授并不擅长进行行政事务的管理，因而他提倡“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的模式。具体来说，涉及行政管理的事务，包括资源的分配、新学科的建设、教员的编制、院长的任命等，由校长独自决策；与学术相关的事务，如课程的设置、学位的设置、业绩的考核、教员的聘用等，尊重教授的决策权。这就使得大学校长的作用变得十分突出。张维迎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职业化的管理者，对学校的发展负主要责任，不能既做科研又做行政管理，也不应该成为政府官员。

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他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学校过度管制，要鼓励学校之间的良性竞争。在竞争的压力下，大学会更加注重引进优秀的教师和学生、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以便创立和维护自身的品牌，这正是美国高校的成功之道。相反中国政府管制过多，导致大学更多的在意如何与政府搞好关系，而非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最终形成政府投入不断增加而大学质量却无法提高的困境。

2. 大学改革理论引发的争论

张维迎对大学改革的思考，最终落实成为《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改革方案》。该方案一共有两稿，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涨。总结起来，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质疑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上：

第一，北大的改革是否符合现行法律。甘阳等人认为，北大“不升即走”的晋升制度把职务晋升与聘任关系挂钩，没有法律依据，尤其是解聘已在岗多年的教师，有可能违反“劳动法”、“教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⁸⁰

第二，用企业的逻辑治理大学是否合理。李猛认为，张维迎是把北大比喻为落后的国有企业，其改革实质上就是引入竞争机制，对北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师管理体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但学术竞争应该有自己的规则，市场规则并不一定适用。⁸¹

第三，以副教授为起点的淘汰机制是否演变为变相裁员。一般来说，大家普遍认为副教授是大学的正式教师，而北大教改方案却将副教授视为试用教师，列为可解聘对象，这使得人们不禁担心北大教改实际上是一场冠冕堂皇的裁员行动。第四，学习西方制度是否就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张维迎的改革方案处处强调学习美国的大学体制，有人认为在中国没有规范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大学竞争市场的前提下，移植西方的大学体制会水土不服。而且单纯的追求与国际接轨，很可能会使北大变成西方学术界的附庸。第五，大学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教师队伍还是行政管理体制。以袁祖望为代表一部分人认为，高校的最大问题是“官本位”现象严重，管理体制比人事制度改革更加急迫。⁸²

面对质疑，张维迎和支持其改革方案的学者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回应。关于改革的合法性，邓峰认为改革总是超前的，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即使没有现行法律作为依据，也不能认为改革不合法。⁸³关于用企业逻辑来治理大学的问题，张维迎多次强调自己是把大学作为一个非盈利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来看待的。郑志刚则认为，企业的逻辑与大学的逻辑也并非完全对立。⁸⁴

至于把副教授作为淘汰的起点，张维迎解释说大学改革应该遵循公共理性，考虑的是是否对社会有利、对大学有利，而不是是否对教师有利。关于模仿西方大学体制的问题，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学习西方既定的且被证明有效的大学体制，便可以表明中国是在认可国际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参与竞争的，这比中国自己制定规则再寻求认可有

利的多。最后，关于改革突破口的问题，张维迎认为提高大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因而人事制度改革最为迫切，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带动下逐步实现。

3. 张维迎大学改革理论的优势与缺陷

围绕张维迎的教改方案进行的这场社会大讨论是全面而深刻的，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时至今日北大的改革依然没有彻底展开，学者们也依然在探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在笔者看来，张维迎的教改方案实际上是把大学当作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殊的企业来看待的，用改革国有企业的思路来对大学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并参与国际竞争。从基本精神上看是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可说是一条较为实用的改革路径。事实也证明，尽管争议不断，但近些年中国各大学的改革尝试，也基本是循着张维迎的思路进行的，只是在其薄弱之处做了一些修改补充和因地制宜的变通。

然而，这个改革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具有市场化改革的通病，失之操切、标准单一、且缺乏人文关怀。其次，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往往会产生一些理论预期之外的负面影响，而且完全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进行人事管理也并不可取。最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不应该只是培养科研人才，它需要为社会各个领域养育精英，相应的一流大学的教师选聘，也不应该把科研能力当作唯一标准。张维迎的改革思路偏重科研，单纯以科研能力评价教师，未免过于片面。

总之，张维迎的教改思路是运用市场逻辑改革大学，可以说是在用经济学理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就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来看，大学的改革必将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张维迎的改革方案尽管有诸多不足，但仍不失为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V. 张维迎论经济学的人文精神

以上讨论也引导和启发我们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描摹和了解，除了上述分析之外，张维迎对经济学的转型及经济学家角色的阐释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可以说是从总体上把握其思想脉络的切入点。具体而言，张维迎认为市场经济应该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的初衷，回归经济学的使命，推动制度变革和完善，从而使人们更好地合作，提高社会的福祉。

1. 重归亚当·斯密

作为“经世济民”之学，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经济学从来都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科。经济学学科发展至今虽然有极为细密的学科分殊，但作为一个学科整体，经济学学科本身的研究目标并非始终如一，尤其是现代以来，古典经济学所设立的理论框架被不断否定，由此，对经济学学科的使命本身也产生了多元理解，因而也呈现出研究旨趣上的不同。例如，经济学形成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关于市场和计划的重大分歧。这种分歧实际上是对经济学学科本身应该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根本分歧决定的。

对此，张维迎本人用“反思经济学”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到：“我个人倾向认为，我们经济学真正应该转向研究什么？人类如何更好地合作，或者说理性人如何更好地合作。”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就是它最大限度促进了人类的合作。与传统社会里面熟人之间的合作不同，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使陌生人之间进行合作。即便在今天 99.999%的合作者我们都不认识，甚至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但是彼此却可以合作，这就是市场的价值所在。今天消费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全世界合作的结果。

因而，经济学不能像今天的主流经济学一样只被理解成资源配置的理论，“我认为应该把它转变成人类合作的理论。只有如此，过去

好多忽略的东西,包括企业家精神,包括信任、组织、法律、社会规范,甚至道德这些东西,才能够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他进而认为,“尽管我们经济学充满了技术性的图、公式,但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学总体应该具有人文精神。”⁸⁵

何谓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在张维迎看来就是重新重视亚当·斯密在三百多年前所强调的关注人类福祉——即使人类的生活状况从根本上已经得到改善。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经济学学科的创立者,探讨人类福祉和人类合作的命题在亚当·斯密那里甚至比经济学本身更重要。与《国富论》相比,《道德情操论》在亚当·斯密心中更具分量。《道德情操论》(1759年)不仅在时间上比《国富论》(1776年)更早出版,而且在其身患重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的情况下,亚当·斯密仍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这本书竭力进行修订,这确凿无疑地说明了伦理学或道德在斯密心目中的地位。质言之,在斯密那里市场经济是由诚信、同情心等道德观念支撑起来的、讲道德的经济,且最终为人类更好的合作和更幸福的生活服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误解了市场。

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赚钱或追求个人利益是不道德的。但在“两百多年前,人类发生了一场道德思想的革命,这场革命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动的。亚当·斯密之前,追求个人利益就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亚当·斯密颠覆了这个传统观念。他证明,自利本身并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在市场经济下,自利之心正是利他之行的主要驱动力。”⁸⁶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而这种协作并不是靠某者施恩、馈赠于某者就能够实现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⁸⁷斯密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绝不是出自屠夫、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

算。……在面对他人的时候,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之心的话,而是会说唤起他们利己之心的话。我们不会站在自己需要的角度,而必须指出这件事对他们也有利。”⁸⁸

人类正是通过交换而逐渐完成了分工,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尽力实现一个并非其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但没有考虑社会利益,并不意味着就对社会有害。一个人通过追求其自身利益进而促进社会利益,往往比他有为之更有效。这恰恰是市场或交换的魅力所在:它能将个体自私的利己心转化为利他的仁爱心,能通过转化自利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祉。因而,自利就成了经济运行的内驱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就成了发展人类幸福的实现机制。

张维迎认为“市场使得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给别人带来价值”,“市场会促进理性人之间的合作”,这些亚当·斯密时代的命题并未过时,“经济学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算起,只有236年的历史。但经济学对人类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提升的贡献是巨大的。亚当·斯密在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证明市场是人与人合作最有效的手段。今天我们看到,真正遵循亚当·斯密的理念、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合作精神和道德水准比非市场经济国家高得多。”⁸⁹

亚当·斯密的理论总结起来有两个:一个是分工理论;一个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其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一个国家怎么能变得富裕,人们生活怎么能得到改善。张维迎认为自《国富论》发表100多年后,经济学就开始背离了这一主旨目标而开始走偏。特别是大概从1870年代开始,主流理论开始放弃了亚当·斯密研究的发展、分工、技术进步,转而关注市场均衡和财富的分配,这种新古典经济学成了现在主流经济学的模板。尽管这种理论出现在亚当·斯密理论100多年后,但并不证明这种理论就比亚当·斯密的理论正确。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对我们理解供给需求关系如何影响价格、价格如何影响资源配置,以及对

我们预测政府管制价格的后果(如短缺、排队、走后门、腐败)是有价值的,但它没有办法指导我们如何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取舍。

“在张维迎看来,资源的配置对经济学或对整个社会来讲,只是一个方面,非常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市场不是给定技术、给定偏好、给定资源下怎么把资源配置得更有效,而是怎么创造新的技术,怎么改变人的偏好以及怎么创造新的资源。这才是经济学应该研究的。质言之,我们依然应当运用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去理解过去两百年的人类发展和未来发展。基于此,在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这个主题上,张维迎强调了未来经济学的走向,正如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理念决定行动。“经济学研究什么?传统上讲,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市场均衡。我觉得这些定义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导性。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⁹⁰

2. 经济学的转型

根据亚当·斯密的启示,当前中国经济学研究要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完成其转型:

第一,经济学要关注和解决理念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并非全是因为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理念的冲突,而且许多看似利益冲突的东西实际上是理念冲突。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全是利益冲突,雇主和雇员、农民和工人、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都只能通过斗争解决问题,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⁹¹张维迎认为仅仅从利益的角度理解社会是有偏颇的,革命传统所遗留的阶级斗争学说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为很多问题本质上并非因为利益,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无知”,进而又因“无知”而产生理念上的对立。

而且,即便利益本身也是由理念构造的,这意味着尽管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利益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客观的标准,而

是依赖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去理解它。他坚信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的观点:“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的。”⁹²理念来自思想市场,在思想市场中,不同的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可以同时并存,而且它们之间可以有平等和自由的竞争。经济学应该在减少信息不对称上用力,以减少人们的“无知”,同时这也是经济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意义。

其二,经济学要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他认为功利主义经济学支配了当下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取向。他将功利主义划分为个体功利主义和社会功利主义两个方面:个体功利主义就是每个人都趋利避害,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社会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化所谓的“社会福利”。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用目的的正当性来证成手段的正当性。评价任何事情的标准都是以后果的好坏为圭臬的,即只要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个目标是“经济增长”、“国家利益”,还是“社会福利”。

张维迎认为“市场不仅仅是GDP增长的工具,市场也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卓越的一种途径。只要我们尊重了人的基本权利,给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然就会到来。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和政策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⁹³

他将与功利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正义标准称为权利主义。认为经济学应该将主要工作转向权利主义。权利主义是说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予以剥夺的,目标的正当性不能证成手段的正当性。权利主义对于市场的捍卫是基于人的道德权利,人的自由本性和尊严。权利主义认为人的基本权利不能以功利的目的予以否定。权利高于功利,权利高于效率,正当优先于善。以此为标准,所谓

“计划经济”从本质而言也是功利主义的，因为它所倡导的“赶超战略”，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作一切政策的标准，也就为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但人的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和前提条件，以自由和人权为基础才会有完善的市场经济。

3. 经济学家的角色转换

与经济学的转向相应，经济学家也应改变自己的角色，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应该为社会制度的建构和良序社会的建立做出贡献，成为“制度企业家”。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和规范是千百年来历史逐步自然演化的结果，而并非人为设计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和忽视的是，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为社会规范的形成发挥促进作用的人被张维迎称为“制度企业家”。相对于传统企业家，制度企业家更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打破制度障碍，最终改变、创造出新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摸索出一整套适合市场发展的模式和行为规范，为人们所接受和使用。

张维迎将制度创新看作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对制度企业家来说，创新意味着让人们用新的价值观念代替旧的价值观念，用新的行为方式代替旧的行为方式，用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代替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意味着我们要认同原来可能不认同的东西或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⁹⁴这些制度企业家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创设之所以能够成功并持续影响后世社会，原因在于他们深谙人性。“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必须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商界企业家只需要理解人们喜欢什么，制度企业家必须理解人的本质是什么。”⁹⁵

不同的制度企业家之所以会提出不同的行为规范和制度架构，原因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只有对人性理解基本正确的制度企业家才能成功。他举例说中国历史上，相对于墨

家、儒家规范之所以能最终胜出，乃在于儒家的“亲亲”原则比墨家的“兼爱”原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状况。

但的确，由于人的复杂性，除了追求幸福这一点，人性很难用一个单一的维度定义，基于人性理解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规范原则，但任何规范和原则都要符合以往制度企业家所积累的共识。张维迎指出这些共识是基于人类社会面临的基本挑战，即博弈论中所谓“囚徒困境”，也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矛盾。他据此总结了人类合作所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五条共识：“以人为本”、“推己及人”、“互助相爱”、“诚实守信”、“奖善惩恶”。为了使得这些行为规范得到有效执行，张维迎认为不仅需要人们有善心，而且需要一个奖善惩恶机制，鼓励制度企业家承担创新风险，人类方有望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为此要呼唤“思想市场”的出现，在这个思想市场中，“制度企业家”们可以自由地相互竞争，接受思想市场的选择和检验。

张维迎所提出的重归亚当·斯密、经济学转向以及中国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对于追求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当下中国社会，可谓是切中肯綮之言。经济学的人文精神，其核心是要将经济学的目光投向人类的幸福和生活的福祉，从这点而言经济学仍然是“经世济民之学”，这种实质主义的学科关怀是经济学从其诞生以来的核心目标。而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一生都将关注人类幸福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看得同等重要，这或许就是张维迎所强调的经济学的人文精神。

无独有偶，重归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人文精神的观点正代表了当代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曾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称为“经济学界的良心”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将社会公众的生活状况看作是政府经济政策得当的标准，将伦理

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之中,将“社会福利”这一目标看作是经济学的终极目标。

在这点上,张维迎的经济学转向正与此经济学研究趋势是一致的。而在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上,张维迎表现出了更多的自觉性,他认为经济学应从博弈论出发去分析实际存在的制度类型,为现代社会的制度进步建言献策。从这点而言,他不仅是一个理论者,也是一个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参与者。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进程中,他所提出的问题能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界思考和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提供些许借鉴和参照。

VI. 结语

回顾张维迎在学术与社会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以上五位博士研究生通过集中报告的形式,分别介绍了张维迎的五个侧面,而这五个方面较好地反映了张维迎的主要学术成果与社会贡献,也引出了一些围绕着他的争议。贡献与争议并存恰恰是张维迎鲜明的个人特点。

从张维迎学术思想中的“奥地利”元素开始,他对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关系的再发现,恰好显示出张维迎在学术上的自我认知和思想转变。张维迎从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理论中发现了市场的深度理解,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好的市场理论”,并由此强调新古典经济学有必要进一步吸收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而这种对自由市场的推崇,显然与重视政府主导作用的改革思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才有了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之争”。张维迎的这些学术观点也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的“市场与政府”和“企业家研究”的理论中。他无时无刻不在强调市场本身的力量和政府干预的弊端,以及在一个良性的市场运作中,企业家及其背后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这些观点显然会常常引发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关注,但也难免引起颇多的争议。

不仅如此,张维迎显然还乐于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引入社会问题的实践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大学改革上。张维迎自2003年在北京大学推动的教学改革,就是一次市场化的大学改革实验,他把竞争和淘汰机制嵌入了原本教职流动固化的大学中,也确实解决了中国大学的一些实际问题。但这样的模式却显得十分残酷,因此也被诟病为缺乏人文关怀。当然张维迎对经济与社会的思考还不仅限于此,他还主张应该重铸“经济学的人文精神”,认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应该为社会制度的完善和良序社会的建构做出应有的贡献。

凡此种种,围绕着张维迎的,既有他为学术和社会作出的不少贡献,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他身上的诸多争议,这也是张维迎的复杂性之所在,所以常让舆论将其视为一个与主流观点相背的“异端”。而不可否认的是,张维迎所引发的这些争议,许多都成为推动社会认知前进的一次又一次契机。这个事实本身也反映出他为复杂多变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的学术进步,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而又难能可贵的张力。

注释*

- ¹ 李春利现任日本爱知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爱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双学位课程博士生导师。
- ² 许昊、腾兴建、李梁楠为南开大学和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双学位课程 2017 级博士生，张龙、杨建强为中国人民大学和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双学位课程 2017 级博士生。
- ³ 参见李春利等：“产业政策存废之争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思辨会（日本篇）综述”，*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 10(1)2017.
- ⁴ 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第 10 页。
- ⁵ 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社会科学战线》，2004（3），第 65 页。
- ⁶ 黄雄：“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文献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8（4），第 55 页。
- ⁷ 同上，第 56 页。
- ⁸ 同上。
- ⁹ 贾根良：“奥地利学派的演进：传统与突变”，第 66 页。
- ¹⁰ 同上，第 65 页。
- ¹¹ 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贡献——从《人的行为》谈起”，《江淮论坛》，2009（1），第 63 页。
- ¹² 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第 21-22 页。
- ¹³ 米塞斯：《人的行为（上）》，夏道平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第 53 页。
- ¹⁴ 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第 112 页。
- ¹⁵ 黄雄：“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文献综述”，第 56 页。
- ¹⁶ 米塞斯：《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第 105 页。
- ¹⁷ 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贡献——从《人的行为》谈起”，第 64 页。
- ¹⁸ 同上，第 65 页。
- ¹⁹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4），第 10 页。
- ²⁰ 米塞斯：《社会主义》，王建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98 页。
- ²¹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第 8 页。
- ²² 米塞斯：《社会主义》，第 98 页。
- ²³ 黄雄：“奥地利经济学派：一个文献综述”，第 56 页。
- ²⁴ 米塞斯：《社会主义》，第 103 页。
- ²⁵ 同上，第 104 页。
- ²⁶ 黄雄：“浅析米塞斯的经济贡献——从《人的行为》谈起”，第 66 页。
- ²⁷ 同上。
- ²⁸ 高保中：“市场经济与竞争均衡：哈耶克的启示与超越”，《南开经济研究》，2004（4），第 13 页。
- ²⁹ 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 93-96 页。
- ³⁰ 邓正来：《哈耶克社会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5 页。
- ³¹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第 9 页。
- ³² 安德鲁·甘布尔：《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王晓冬、朱之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 页。
- ³³ 同上。
- ³⁴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04 页。
- ³⁵ 杨春学：“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第 14 页。
- ³⁶ 张维迎：认同奥地利学派 中国的反凯恩斯起义，<https://www.chinaventure.com.cn/cmsmodel/news/detail/221919.shtml> (2012 年 10 月 23 日)。
- ³⁷ 张维迎：“张维迎：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374>

- 2935575/385259?column=licai&ch=9 (2017年9月2日)。
- ³⁸ 同上。
- ³⁹ 周政华：“张维迎：市场信仰者”，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820/12962769_0.shtml (2014年8月20日)
- ⁴⁰ 张维迎：“张维迎：我是如何认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
- ⁴¹ 张维迎：“理念决定未来”，《读书》，2012(7)，第12页。
- ⁴² 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学术界》，2017(2)，第28页。
- ⁴³ 同上。
- ⁴⁴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11月14日，第B05版。
- ⁴⁵ 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第31页。
- ⁴⁶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中国的变革”，《探索与争鸣》，2011(2)，第9页。
- ⁴⁷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 ⁴⁸ 同上。
- ⁴⁹ 同上，第5页。
- ⁵⁰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序言，第iv-v页。
- ⁵¹ 同上，第147页。
- ⁵² 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8-209页。
- ⁵³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 ⁵⁴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第14页。
- ⁵⁵ 同上，第249页。
- ⁵⁶ 同上，第141页。
- ⁵⁷ 同上，第245页。
- ⁵⁸ 同上，第114-123页。
- ⁵⁹ 张维迎：《市场与政府：中国改革的核心博弈》，序言，第ii页。
- ⁶⁰ 同上，105页。
- ⁶¹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8-100页。
- ⁶²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第52-53页。
- ⁶³ 盖凯程：“‘市场的逻辑’的逻辑——与张维迎商榷”，《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2)，第109-118页。
- ⁶⁴ 《领导文萃》，2014年11月23日。
- ⁶⁵ 刘紫玉：“政府与市场：读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的思考”，湖湘论坛，2011(1)，第102-104页。
- ⁶⁶ 奚兆永：“张维迎《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一文质疑”，《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2)，第130-140页。
- ⁶⁷ 李春利等：“产业政策存废之争与中国经济发展——产业政策思辨会（日本篇）综述”，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 10(1)2017.
- ⁶⁸ 张维迎：“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读书》，1984(9)，第13-22页。
- ⁶⁹ 张维迎：“企业家与所有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报告》，1986(30)。
- ⁷⁰ 张维迎：“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人民日报》，1986年9月19日。
- ⁷¹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 ⁷² 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⁷³ 张维迎：《产权、激励与公司治理》，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 ⁷⁴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2010年。
- ⁷⁵ 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 ⁷⁶ 三篇文章分别是汪丁丁：“有恒产者有恒心——评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兼评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曙光：“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 ⁷⁷ 张维迎：“关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写作背景的说明及对三个书评的答复”，《中国书评》，1995(5).
- ⁷⁸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 ⁷⁹ 同上，第9页.
- ⁸⁰ 甘阳：“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21世纪经济报道》，2003年6月5日.
- ⁸¹ 李猛：“如何改革大学?——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方案逻辑的几点研究”，《学术界》，2003(5)，第45-64页.
- ⁸² 袁祖望：“《大学的逻辑》未必都合乎大学的逻辑——与张维迎先生商榷”，《现代大学教育》，2005(6)，第22-25页.
- ⁸³ 邓峰：“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的法学思考”，<https://www.douban.com/note/324141758/> (2013年12月31日).
- ⁸⁴ 郑志刚：“也谈‘如何改革大学’”，《学术月刊》，2003(5)，第65-73页.
- ⁸⁵ 张维迎在浙江大学的演讲，题目为“经济学理念的变革”，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968.html>
 (2016年3月21日).
- ⁸⁶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君子之道，《南方周末》2017年4月6日.
- ⁸⁷ 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5，第11页.
- ⁸⁸ 同上.
- ⁸⁹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序言，第2页.
- ⁹⁰ 张维迎：《理念的力量》，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第21页.
- ⁹¹ 张维迎：“反思经济学”，《经济观察报》，2014年5月4日.
- ⁹² 张维迎：《理念的力量》，第3页.
- ⁹³ 张维迎：“改革要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经济观察报》，2014年7月11日.
- ⁹⁴ 张维迎：“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第16-35页.
- ⁹⁵ 同上。

(参考文献省略)